

习近平的三个“三大追问”的理论内涵研究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三大追问,核心是解决“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改革开放的三大追问,核心是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三大追问,核心是解决长远发展问题。

关键词:习近平;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4-0006-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深入分析和把握这些问题的内涵,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一、三个“还能”的追问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1]137-138}解决“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这一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 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使办企业、上项目不需要繁杂的审批环节

李克强总理2016年3月28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许多企业和群众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审批事项仍

然过多。去年国务院大督查发现,有的投资建设项目要经过40多个审批环节、盖100多个公章;有的工业建设项目,需要花2年多时间跑审批。我到地方调研,这方面问题反映还比较强烈。前几年,地方一位政协委员展示了一张审批的‘万里长征图’,现在审批程序简化了,可能变成‘千里长征’或‘百里长征’了,但仍然是‘长征’。所以还得压,能放给市场的尽量放给市场”^[2]。企业在经历40多个审批环节、盖100多个公章的“长征”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搞门道的问题,不仅会滋生腐败的土壤,而且影响到企业发展的积极性。要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消减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这包括: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大力推行网上办事,减少企业与审批部门人员面对面打交道的机会和次数,就会有效地防止靠关系等问题发生的机率。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言: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2016年5月9日,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今年再削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50项以上,削减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比例达到70%以上,削减一批生产许可证、

收稿日期:2016-06-18

作者简介:辛向阳(1965—),男,山东安丘人,研究员,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经营许可证和资质认定。为更好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性作用,中央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要达到90%以上,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纳入全国统一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一站式’网上并联审批,明确标准、缩短流程、限时办结。要进一步提高放权的协同性、联动性,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域的审批事项,相同或相近类别的要一并取消或下放,关联审批事项要全链条整体取消或下放。”

2. 按照公平性原则,完善升学、就业方面的制度

如果背景性因素在人们成长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阶层固化和不流动性。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十余年中,社会流动性又趋于下降。从长远看,这种趋势的延续,可能固化既得利益和贫困阶层,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失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问题。2015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指出,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015年9月9日,习近平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回信时谈道: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16年3月10日,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又指出:要更加注重教育脱贫,不能让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一切公平的起点,教育不公平,社会公平就难以保证,推进教育公平,必须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让更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形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的信息差距,使边远、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就近享受到信息文明的洗礼,防止信息鸿沟的出现;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2020年,基本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把更多的优质资源配置到薄弱学校,破解择校难题。其次,大力促进就业公平。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要通过制度的完善,逐步消除群众反映强烈的“萝卜招聘”现象和“因人画像”“绕道进入”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相当多优质岗位都被关系生所占据。第三,还要努力实现社

会保障的公平性。

3. 通过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切断权力与利益的交换

首先,干部要自觉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有好的发展机会应当先考虑广大群众,而不是个人或者自己家庭的利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增强党内监督主体监督意识,使广大党员能够主动监督干部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侵占群众利益和机会的问题能够站得出来进行监督。为此,就要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监督主动性不强。一些党员、干部对党内存在的不正常情况,不能主动自觉地批评、制止、纠正,而是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办法;还有人认为监督会影响工作效率,不利于内部团结,奉行“和事佬”原则,将个人置之事外,明哲保身,更有甚者,对于责任范围内出现的问题,认为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千方百计遮掩修饰,文过饰非。二是存在畏难情绪。有些党员、干部在实施监督中一旦触动实质问题,或监督对象强烈抵触时,就存在畏难情绪,缺乏把监督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导致监督半途而废。三是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有些党员将党内监督看成“麻烦事”,虽然党章规定,加强党内监督是每个党员、干部的责任、义务,但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以“加强党内监督为己任”。而对监督问题都是“敬而远之”,不但自己不主动去实施监督,而且需要自己配合时也千方百计推脱。要制定有效的制度确保广大党员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不畏难、不怕事,对于损害群众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的事情敢于监督。

二、三个“靠什么”的追问

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3]。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成熟定型的制度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

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中国,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设法治中国,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达到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的标准要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化的财税体制,使财税体制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通过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建设活力中国和平安中国,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的问题能够及时便捷地得到反映、社会矛盾能够迅捷方便地得到化解、群众的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效率又能体现公平

习近平曾经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4]68}。实现公平正义,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告诉我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大量存在,要打破天花板,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

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创造更多的制度平台,让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次,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建设。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为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市场法律基础;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严肃查处侵犯非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合法权益的行为,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加强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3.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面临的各種深层次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4]86}。“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4]87}。首先,要解决各种深层次问题。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福利陷阱”“塔西佗陷阱”等五大陷阱问题,确保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不被各种陷阱所迷惑;解决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等短板问题,补齐短板,在薄弱环节上多用力,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均衡、更加协调和健康;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家庭和陆、安全卫生等利益问题,形成更加和谐的局面。其次,处理好一系列事关全局发展的重大关系。主要包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一方面,要强调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都纳入法制轨道,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这些纷纭复杂的事物关系中

把准改革的脉搏。

三、三个“如何”的追问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4]99}。这三个问题既是近忧问题,又是远虑问题。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奋进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梦实现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第二个百年中国梦,即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第二个百年前进,有着具体的路径:第一,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到2020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有了这一基础,到2049年就能够建成开放型经济强国。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意见》还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第二,建成世界一流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落实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第三,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保到2020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2030年的基础上再奋斗20年就能够成为世界上真正一流的科技强国。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纲要》进一步描绘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科学技术发展的“三步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创新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体系协同高效,创新环境更加优化,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总体上扭转科技创新以跟踪为主的局面,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完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技和人才成为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创新成为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核心因素,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第四,建设体育强国和足球强国。2016年4月11日,国务院同意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规划》提出到2050年的远期目标是:全力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

2. 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就要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周期率问题。2012年12月24日全天和25日上午,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党派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1]701}。这就指出了长期执政的根本途径即增强四大能力。其中自我完善能力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培养和维护领导集体的能力。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指出:“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有序更替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是坚强有力的。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所所长李熙玉2016年3月24日在韩国《中央日报》网站发表文章探求中共为什么会“百年长寿”。他谈了八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五条是:培育新一代接班人。他说:“中国共产党坚信,好的干部离不开自己的热情努力和党组织培养系统。举例来说,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干部至少要经过20年以上的培养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位干部可能先后掌管过两三个省份的工作。考虑到中国一个省份的人口可以多达数千万,其难度无异于执掌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共产党高层干部的选拔过程虽然不为人知,但至少人们可以轻松预测谁会成功得到选拔”^[5]。中国共产党有培养领导集体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领导人是集体选择、长期培养的产物。按照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研究,领导人产生要有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市区委书记,这是能力、知识、信息、经验“加速积累期”;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这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我们不仅有培养领导集体的机制,而且强调维护这一全国人民爱戴的领导集体的权威。1989年6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么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6]。我们现在就是要自觉地树立向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的意识,自觉地维护中央权威。

3. 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全面依法治国,使国家治理现代化、高效化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观点。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

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4]91-92}。又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4]92}。他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4]99}。首先,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其次,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各项改革举措深入推进,社会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只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就能依靠法治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種社会矛盾和问题,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三大追问”既是我们党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集中反映,深化了对于经济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 李克强. 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4-15(02).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86.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5] 李熙玉. 韩学者总结中共百年“长寿秘诀”[N]. 参考消息,2016-03-28(14).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0.

(责任编辑:许宇鹏)